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对档案的界定，民间史料亦可称为民间档案，应属“档案之内”的资料。但与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档案大不相同的是，民间史料中最大量的是社会底层全景式的实录，原始、真切而又鲜活。无论是内容，还是表达方式，都为官方档案所不能及。

民间史料“内外兼具”的特质在基层单位档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从这些掌握着“小人物”命运的档案中，可解读出上层官方记载之外的底层社会的政治生态。

私家收藏的工作笔记、日记、书信等资料在中心的民间史料中颇引人注目。悉心保存这些珍贵的“独家历史”的档主，既有知名的中共高级干部，也有大量基层“芝麻官”，更多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。

丰富的私家历史材料提供了解读当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路径：“由大及小”地接近微观社会与个人的历史“真实”，包括“个性化”及“在地感”或“在场感”。只有当宏大的历史性巨变化约为每一个个体的人生故事，通过各种复杂多变的人生面相在“小社会”中得以展开之时，这部大历史便不只是国家的整体史，极权主义、革命、现代化等等中国当代史的解释框架，才不致于日益乏力，而显现出其鲜活的价值与意义。

日記與中國近代史研究——以《蔣介石日記》為例的討論

呂芳上（台灣中央研究院·國史館前館長）

在中國近代史學界，最近出版私人日記，利用日記作為歷史研究的素材，可說蔚然成風。最顯著的事例之一是蔣介石日記（1917-1972）的開放與運用，的確帶動了民國史研究的新風氣。

以蔣介石日記作為素材的近代史研究，有幾點值得注意：一、日記的確有助於歷史細節的了解與認識。利用《陳誠日記》、《陳克文日記》，可以看出二戰時期孔氏家族作風不無可議之處，察考蔣日記也有類似批評；提到國軍軍紀不佳，原因之一是軍人營商的壞風氣，這是蔣介石一再告誡軍人不得經商的理由。討論 1948、1949 年國民政府的危局，利用《胡宗南日記》與蔣介石的日記對比，看出兩人對守重慶，及成都、西昌留守問題主張的落差。蔣介石威嚴而有個性，能直接進諫的周邊人物不多，楊永泰、張治中、熊式輝是其中三人，以熊式輝日記為主要依據的《海桑集》，點出蔣有「一柄兩操」、「用人牽制」、「越級指揮」之病，這可能是蔣 1949 年前後內外交迫變局下失敗因素之一，蔣的日記依稀可稽。二、近身、長時間觀察的日記，較有助於事物的了解，蔣介石日記長達五十五年，閱讀其日記，堅毅、不妥協個性躍然紙上。對照沈錡、雷震日記，從吳國楨案、王世杰案、孫立人案到雷震案，蔣「自運樞機」，討厭「恃外凌上」，不受美國干涉，也不屑被視為自由派如胡適等人的指手畫腳，很見蔣倔強個性。拿日記及檔案合併考察，許多人指出蔣的政治風格是重文物、喜手令、注意黨性黨德、以敵為師、以宗教信仰為救贖之道，讀其日記很可體會。《胡宗南日記》中說蔣「軍事認真，政治敷衍」（1942 年 3 月），是有感而發；《陳誠日記》說「垃圾倒在委座看不到的地方」（1944 年 2 月 18 日），對官府推、拖、拉惡習，尤見諷刺。國人的陋習，蔣知道，也愛管，但無奈。三、好的日記，最好是記述時間長，內容鉅細靡遺，百無禁忌、暢所欲言，尤要能有所感，而能察內情、說關鍵，尤屬上乘。在日記求全不可能的情況下，要避免「摸象」之譏，使用者不能以偏概全，或以全視偏。也就是說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，才能裏外通貫、掌握全局。

近年來日記大量出版，自是研究近代史者的福音，不過，使用日記，仍得留意作者寫法、習慣與目的。為自己寫的日記多失之片面主觀，為別人而寫的日記往往事多隱晦，等而下之，造假的日記，固不可取，子女、夫人淪為日記殺手時，史家更只能徒呼負負。日記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手史料，仍宜利用檔案及他人記載作比較、對証，以求歷史真相，免落入單一史料之弊。

